

昭和史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昭和史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著

吳文譯 趙世英校

昭和史

譯自日本岩波書店岩波新書1957年版

昭和史

〔日〕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著
吳文譯 趙世英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北京商標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6 · 字數 124,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 定價(9)0.65元

統一書號 11002·210

校對者：龔玲娣等

目 次

序	5
第一章 昭和新政	7
第一节 时代的转变期	8
人民和天皇(8) 共同印刷厂和木崎村的斗争(8) 三 党首协商(11)	
第二节 金融危机下的政变	13
金融危机(13) 田中内阁的出现(15) 中国革命和日 本(16) 从幣原外交到田中外交(13)	
第三节 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20
芥川龙之介的自杀(20) 东方会议(21) 一九二七年綱 領(22) 初次普选和三一五事件(23) 第二次山东出 兵(25)	
第四节 “滿洲某重大事件”	27
修改治安維持法(27) 田中内阁倒台(28) 滨口内阁和 “黄金解禁”(29)	
第二章 从经济危机到侵略战争	32
第一节 大经济危机和日本	32
世界经济危机(32) 日本的经济危机(34) 飢饉的丰 年(37) 加迪尔、托辣斯和康采恩(38)	
第二节 动摇着的统治体系	40
危机时期的工农运动(40) 朝鮮和台湾的民族斗争(43) 普罗文化运动(43)	
第三节 右翼分子的抬头	45
走向軍国主义的道路(45) 右翼团体的作用(46) 倫敦 条約問題(48) 三月事件(50)	
第四节 九一八事变	51

柳条沟事件(51) 九一八事变的意义(53) 十月事件(55) 犬养内閣和重禁黄金出口(56) 一二八事变和“滿洲国”(57)

第三章 在“非常时期”的名目下 59

第一节 五一五事件 60

反战运动(60) 血盟团和五一五事件(61) 貧困的农村(62) 天皇制和32年綱領(63) 齋藤内閣(65)

第二节 軍国主义的道路 67

退出国联(67) 高桥财政政策(69) 軍需工業和傾銷(70) 官僚势力的前进(72) 數員左傾和瀧川事件(73) 日本文化的特征(75)

第三节 二二六事件 76

“滿洲国”的内幕(76) 陸軍小册子事件(79) “天皇机关說”問題(81) 相澤事件(82) 中国的抗日运动(83) 二二六兵变(84) 由兵諫到叛乱(86)

第四节 准战时体制 87

建立統一战綫的号召(87) 軍人的跋扈(88) 林銑十郎内閣(90) 日德防共协定(91) 西安事变(93) 統一战綫的挫折(94)

第四章 沒有終局的战争 98

第一节 中日战争 99

蘆沟桥事变(99) 战争扩大的原因(101) 企圖速战速决的失败(102) 张鼓峰事件和攻陷武汉(104) 趋向长期战(106)

第二节 国家总动员 108

战争体制的进展(108) 抵抗組織的解散(111)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13) 諾蒙坎事件(114) “复杂离奇”的新形势(116)

第三节 近衛新体制 117

长期战下的民众生活(117) 議會开除齋藤(118) 成立汪伪政府(120) 近衛再次上台(121) 日德意三国同盟

盟(122) “大政翼贊会”的性質(123) 新体制运动的結局(125)	
第四节 太平洋战争的前夕	127
日美談判的开始(127) 德苏战争与关东軍特別演習(130) 东条內閣(132) 日美开战(134)	
第五章 战争的末路	136
第一节 战争初期的胜利	137
初期的进攻作战(137) 胜利中孕藏着的敗因(138) 东条內閣的独裁(141)	
第二节 战时經濟的实質	144
战局的轉折点(144) “大东亚共荣圈”(145) 战时經濟的矛盾(148) 壟断資本的暴利(150) 飢餓中的民众(152)	
第三节 “一亿玉碎”	154
民众的厭战(154) 东条內閣的下台(157) 日本軍的潰灭(158) 結束战争的工作和焦土决战(160)	
第四节 接受波茨坦公告	162
雅尔塔会談(162) 波茨坦公告(163) 原子弹和苏联参战(164) 投降(166) 保存天皇制度(167)	
第六章 战后的日本	171
第一节 占領政策的演变	172
大战的灾祸(172) 民众的奋起(173) “民主化”政策(174) 修改宪法的經過(175) 中道內閣的作用(177)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決(179) 自由党和共产党(180)	
第二节 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	181
內外的备战政策(181) 朝鮮战争(182) 軍事基地化和旧金山条約(184) 世界和平运动的發展(185) 日本的和平力量(186) 进入新的时期(188)	

序

昭和年代的历史，和我們的各种回忆有着牽連，而这些回忆的每一个場面又都籠罩着沉重的战争陰影。

我們不能再重复这种残酷的战争體驗。有着这样的心願并正在为此而努力的我們，有回顧过去的體驗和正确地認識它的本質的必要。

到目前为止，出現了各种各样的回忆录或战記。但大多是战争責任者替自己辯护的东西，或仅仅是通过当事者的狹窄的經驗而看到的历史的一个片断。这些是多少都帶有片面的和主觀的分析。甚至也不能說絕無企圖使人民忘却战争的痛苦而重蹈旧轍的东西。另一方面，現代史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在这两三年來也有显著的进展，可惜还没有广泛地普及起来。

这本书是想把学界研究的成果联系着政治、外交、經濟的动向，来認識我們所體驗过的人民生活的演变。著者尤其关心的是为什么我們人民被卷入了战争？为什么人民的力量没有能够制止战争？弄清过去使人民的力量潰灭的条件和現在有什么不同，是可以給爭取和平和民主主义的力量以正确的方向和信心吧！即使由于著者的才疏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也希望得到讀者諸君的严峻的批評，以求繼續努力。

最后我們对历史学研究会近代史部会及其他多数研究

者的貴重研究成果給我們的幫助和編輯部中島義勝氏在史料等方面的各種援助表示衷心的謝意。

著 者

1955年10月20日

第一章 昭和新政

- 1925年 (大正14) 制定治安維持法、普通選挙法(3月)。总同盟分裂，日本労働組合評議会創立。中国五卅惨案(5月)。护宪三派分裂，成立宪政会第二次加藤内閣(8月)。禁止成立农民劳动党(12月)。
- 1926年 (大正15) (昭和元年) 若槻内閣成立。共同印刷厂罢工(1月)。成立劳动农民党(3月)。浜松乐器厂罢工，新潟县木崎村佃农爭議激化(4月)。承認中国国民政府(6月)。中国国民革命軍开始北伐(7月)。劳动农民党分裂(10月)。日共重新建党大会。成立社会民众党、日本劳农党。大正天皇逝世，皇太子裕仁即位改年号“昭和”(12月)。
- 1927年 (昭和2) 金融危机开始(3月)。若槻内閣倒垮，田中内閣成立。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对中国不干涉运动开始，第一次山东出兵(5月)。召开东方會議(6月)。中国國共分裂。决定1927年綱領(7月)。野田酱油厂爭議开始(9月)。
- 1928年 (昭和3) 第一次普选(2月)。三一五鎮压共产党事件(3月)。禁止劳农党、評議会等結社。中国繼續北伐。第二次山东出兵(4月)。成立全国农民組合(5月)。日本軍炸死张作霖。修改治安維持法，追加死刑(6月)。全国配备特务警察(7月)。共产党書記長渡边政之輔被刺(10月)。

第一节 时代的轉变期

人民和天皇 1926年(大正15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死了,皇太子裕仁立刻繼承了皇位,改元为“昭和”。

“昭和”二字是由中国古典“書經”中的“百姓昭明、万邦协和”二句而来,当时的报纸上加以解释說这是“君民一致,世界和平”的意思,并登載着統治階級的頌詞,期望在这个青年皇帝統治下“昭和中兴,万机一新”。此后昭和年間的历史却正和这个年号的寓意相反而变成天皇制的危机和战争的历史,当时的統治階級即使無由得知未来之事,也一定会感觉到时代已經进入了一个轉变期。

天皇个人的死亡,在本質上則不过是和近代国家历史演变無关的偶然事件,并没有划时代的意义。况且大正天皇已是“脑力漸衰”(1921年宮内省發表)形同废人,自1921年(大正10年)以来,皇太子已处于摄政的地位。然而在由大正改为昭和的背后,存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米騒动”以来的日本資本主义危机和由它所引起的社会混乱;这虽是偶然的巧合,仍然赋予这个时期以历史的意义。

那么自1926年至1927年初这个阶段,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呢?

共同印刷厂和木崎村的斗争 階級斗争加上了新形态的深刻性。根据“朝日年鉴”(昭和3年即1928年版)的記載:“劳資爭議受经济萧条的影响而深刻化,資本家拚命地企圖毁灭工会、农会的傾向自前一年来益加强烈。斗争者方面經過恶战苦斗后終于多遭失败,自大正15年末至昭和2年上半年(1926—27)这段时期,可以称为参加斗争者們

的遭难受苦的时代。”然而，在苦难之中的工人、农民却把他们的斗争武器磨得更锐利了。

东京小石川区的共同印刷厂的斗争——德永直在他的著作“没有太阳的街”里描写了他当时以一个排字工人参加这次斗争的体验——自1926年1月继续到3月，这一斗争被称为全日本劳资两阵营的决战。资方企图以此做为毁灭工会的缺口，和同一系统的资本家以及他们背后的财阀们勾结起来，利用市会议员、警察署长为爪牙，从正面进攻。最后甚至搬出内务大臣、警察总监来“调停”——实际上是镇压。与此相对峙的共同印刷厂工会是在被称为“評議会（原名“日本劳动組合評議会”，创立于1925年）的常胜軍”的出版業工会的领导之下，評議會是日本共产党最大的据点。德永直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在当时半非合法的情况下，全日本的無产階級革命力量，說是集中在东京小石川区长屋町的这个角落里，也不为过。”

和共同印刷厂的罢工并称为工人运动史上划时代的大罢工的浜松日本乐器厂的斗争，也在同年4月开始了，在評議会的领导下斗争坚持了一百零五天之久。厂长的兒子天野辰夫，組織暴力团袭击罢工团和工人家屬，警察在东海道铁路沿綫布下了警备网，企图切断对罢工团的支援。暴力团的恐怖行为和警察的露骨干涉，是这个时期在所有的工人运动中都能看到的特色。进行斗争的工会方面吸取了共同印刷厂的斗争經驗，組織地下領導部和“細胞”（小組）以防备镇压；同时资本家方面的暴行也激起了浜松地区一般工人、市民們的憤怒，他們組織起来支援罢工团，进行了强烈的斗争。

新泻县木崎村的佃农斗争也从4月起激烈起来。在两

年前，新潟县地主会会长真島桂次郎拒絕了佃农們的废除“込米”（米袋內多装的米）的要求，反而訴請禁止佃农进入耕地，第一审的判決是佃农方面敗訴，法院不給佃农上訴的余地，就在三十町步（約三十余公頃——譯者）的耕地上執行了禁止佃农下地的措施；并以“抗拒法律”的罪名逮捕了三十余名进行反抗的佃农。农妇們到处販賣印有地主像貌的面包以获取斗争費用，全村的兒童举行罢課，农民們計劃設立木崎無产小学校和高等农民学校；在全国的支援下采取了持久战的体制而繼續斗争。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开始采取了激烈的方式。斗争不但大規模长期化了，而且一厂、一村的斗争都帶有全体資本家、地主和全体工人、农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色彩。从此开始了工农联盟的第一步，“日本农民組合”（农会——1922年創立）初次参加了1926年五一劳动节的示威游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主动地組織非法組織来对抗国家权力。同时，發生了要求有一个革命的政治力量来和国家权力正面作战的呼声（参考市川正一著“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在大正天皇死去的12月里，在官宪無法探知的極其秘密的情况下，以渡边政之輔为首在山形县的五色温泉召开了重建日本共产党的大会^①。

这种工农运动激化的情况，表现了日本資本主义的危机（參看41頁第二章第二节第五、六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如趁火打劫的强盜似的發了橫財的日本經濟界，

^① 日本共产党創立于1922年（大正11年），后来怕受鎮压的山川均等右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得势，他們認為工人的觉悟提高后自然就会組織共产党，以應該等待工人觉悟的提高为理由，遂于1924年末通过正式的手續就把党解散了。

只做了片刻“暴發戶”的美夢，到了停戰後的第二年即1920年（大正9年）就受到了危機的來襲。這是同樣地降臨到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戰後危機的開始，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被稱為突飛猛進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如何的脆弱。其後，仍繼續着慢性的蕭條狀態，更由於1923年發生了東京大地震而受到強烈的打擊。輸出不振，1926年的入超額達四億四千萬日元，危機在一年比一年加深的情況下由大正年代進入了昭和年代。因此，資本家們進行解雇、降低工資、加強勞動并瘋狂地破壞工會；地主們則成立地主會，惡化了佃耕條件并向法庭起訴，以法律為後盾強行禁止佃農種地、扣押青苗等，進行了露骨的反動攻勢。

由於統治階級開始破壞工會、農會，加速地挑撥了階級鬥爭，其結果所引起的鬥爭的尖銳，和工人、農民的政治意識的高漲，反倒把統治階級吓怕了。本來是依仗着天皇的神秘性的權威和苛酷的統治體制來保持着他們的地位的統治階級，對革命力量是異常恐懼的，它表現在下面所述的政界的活動中。

三黨首協商 在1927年（昭和2年）1月18日，再度召開的第52次會議上，首先由在野的政友會和政友本黨對若槻禮次郎的憲政會內閣提出了不信任案。不信任的理由是：由於有人散布怪文件說圖謀暗殺天皇而入獄的朴烈夫妻受到政府的優待而引起的所謂“朴烈事件”和“招來了深刻的經濟危機，使民眾的生活受到威脅”（據稱該事件的怪文件是右翼的領導者北一輝所寫）兩點理由。雖然是第一黨，但在議會還遠不夠半數的執政黨是無力斥退不信任案的，人們以為內閣必定解散，都期待着實行第一次的普通選舉。

不料若槻首相違反輿論而不實行解散，反使議會停會

三天，于20日和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进行了协商，以“新帝新政之始”为口实要求妥协。对此，两位在野党的总裁以“首相須加以慎重的考虑”为条件撤回了不信任案。究竟“慎重的考虑”是什么意思？虽然执政和在野諸党各下了不同的解释，而我国政界持有的机变性的政治折冲，就是惯于使用这种含糊其詞的条件进行交易的。一般都認为这是議会后各政党之間在私相授受政权。三党首的协商实现了自月初起在政界后台所进行着的停止政爭的策略。因为不論政府、貴族院、执政党、在野党，都强烈地产生了設法避免解散議会的动向。

本来在二年前，护宪三派內閣（首相加藤高明。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所以制定了普通选举法，一方面是为人民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力量所推动，另一方面它的目的却是在于散布普选可以在政治上反映人民的要求这种幻想，以当做防止階級斗爭的“挡箭牌”，进而巩固政党的地位，加强垄断資本的發言权。可是从制定这个法律的当时起，就有人在議会上發出了恐惧的呼声，說如果实行普选恐怕引起激烈的階級斗爭。当时的若槻內务大臣在回答“本法案的基本观念，是不是以民主主义为基础？”这种質問时說：“完全不是如此”。这是老实话，和普通选举法同时曾提請議会通过的还有镇压工农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治安維持法”。尽管如此，政府和政党对于实行普选还是極其畏惧的。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如前面所述的，人民的生活困苦，斗爭开始进入高潮，由于自1926年秋季以来，以評議會（工会）、日本农民組合（农会）和劳动农民党为核心，提出保証耕种权、团结权、罢工权和民主自由等三大要求，組織人民参加了政治斗爭，以致引起了解散議会的請願运动。

第二节 金融危机下的政变

金融危机 由于三党首的协商，政局好像有了片刻的稳定，可是在两个月后的1927年3、4月間，爆發了深刻的金融危机，在經濟混亂之中若槻內閣被枢密院推倒了。

政友会預期着內閣的垮台而使預算案順利地通过，可是当它看出政府想撤开政友会而有和政友本党联合的意圖时，就突然回到了在野党的立場。这时作为攻击政府的口实的就是“震灾支票善后处理法案”^①。

在审核这个法案时，一討論到保有这些空头“震灾支票”的銀行的業務內容，就引起了存款者的蜂拥而至。因此自3月15日以来，东京的二流銀行都相繼歇業；这种金融危机更波及到各地方銀行，以致这些銀行的存戶和有交易关系的中小企業都开始破产。台灣銀行的瀕于破产尤其成了政治、經濟上的重大問題。台灣銀行是为了控制殖民地的金融由政府給以特权和保証而設立的特殊銀行。这个銀行由于它的投資地域台灣、华南、南洋等地市况萧条，向鈴木商店貸出了三亿五千万日元的巨額貸款。鈴木商店由于

①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的灾害，銀行都难以清理其貸款的支票，政府遂命令日本銀行以此項支票为担保来放款，以促进金融的周轉，政府并答应补偿日本銀行以一亿日元为限度的損失費。这类融資的总额达四亿三千八百万日元，而且其中有些因出票人受第一次大战后經濟萧条的打击，已經成了空头支票，所以震灾地的支票不易清理，直到1926年末尚余二亿七千万日元未能实现交换。“震灾支票善后处理法案”是企圖發行十年还清的国债来清理在政府补偿日本銀行一亿日元損失費內尚不能解决的部分。这个法案被非难为以國家資金来救济一部分資本家的法案，可是在3月23日终于在議会上通过了。这个法案也是撤銷黄金出口禁例的准备措施。

第一次大战中的繁荣而扩大了事业的规模，可是在受到战后经济危机的打击后，这时正濒于破产。而台湾银行所保有的一亿日元“震灾支票”中，有八千万日元以上是铃木商店所出。因而风传着“震灾支票善后处理法案”是为了救济铃木商店所制定，所以在议会的讨论中一暴露了台湾银行和铃木商店的关系，社会上的怀疑就集中在台湾银行身上，以铃木商店的竞争对手“三井”为首，以及其他银行都纷纷把资金提出，使台湾银行立刻陷于穷境。

很明显的如果台湾银行一旦破产，经济界就要陷于混乱的境地。必然严重地影响到对台湾、朝鲜等殖民地以及对中国大陆的控制。若槻内阁在国会闭幕后的4月1日，立刻向枢密院提请审核救济台湾银行的“紧急敕令”草案，草案的内容是：责成日本银行通融资金救济台湾银行，并准予由国库拨出二亿日元补偿日本银行的损失。可是枢密院不同意这个草案，在17日召开的会议上正式加以否决了。于是政府当天就提出了总辞职。

枢密院否决这个草案的表面理由，是认为应该由议会做为法律来制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尊重议会的很堂皇的口实，而它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这样，枢密院会议的议程正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曾任“法案精查委员长”的伊东已代治顾问官。他是一个长于权谋的官僚政客，是一个主张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和政友会自创立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伊东在枢密院的会议上攻击了政府的国内外政策，要求内阁下台，特别指出因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软弱”而无方针，以致在中国的权益受到破坏而引起了经济危机。伊东与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骥一郎以及政友会的主要人物铃木喜三郎、森恪等有联系；森与政友会